

## 目 录

□ 前言 .....	(001)
□ 序言 .....	(001)
□ 作者自序 .....	(001)
第一章 前往暹罗和中国的航行(1685—1688) .....	(001)
第二章 张诚在鞑靼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旅行 .....	(010)
中俄《尼布楚条约》 .....	(010)
谈判的前奏(1688) .....	(013)
《尼布楚条约》谈判 .....	(015)
第三章 张诚在鞑靼的其他旅行 .....	(027)
第三次旅行(1691) .....	(028)
第四次旅行(1692) .....	(038)
第五次旅行(1696) .....	(041)
第六次旅行(1696—1697) .....	(050)
第七次旅行(1697) .....	(057)
第八次旅行(1698) .....	(067)
第四章 从张诚寄往欧洲的书信看其 1690 至 1700 年间在 北京的生活 .....	(078)
1692 年的谕旨 .....	(091)

1700年11月30日的谕旨 .....	(095)
第五章 1701至1705年间张诚的书信 .....	(098)
第六章 从张诚1690至1705年间的通信看其与巴黎外方 传教会的友好关系 .....	(125)
第七章 教宗特使来华及其在北京的逗留(1705—1706) ...	(139)
第八章 张诚的最后几个月 .....	(145)
耶稣会士张公之墓 .....	(148)
<input type="checkbox"/> 征引文献 .....	(149)
一、手稿 .....	(149)
二、张诚著述 .....	(154)
三、已出版文献 .....	(158)
<input type="checkbox"/> 大事年表 .....	(169)
<input type="checkbox"/> 译后记 .....	(176)
<input type="checkbox"/>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已出版书目 .....	(183)



## 前 言

1982年南怀仁研究中心在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之内成立,目的是为了提倡中国天主教教会史的研究,特别是欧洲传教士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以及双方友好关系的贡献。首先我们强调的是南怀仁的研究,南怀仁是一位诞生于比利时的传教士,也是中欧关系史上的伟大先驱者之一。他在1688年去世不久之后,即因为在中国的伟大贡献而在比利时声名大噪,18世纪布鲁日为他建了一座雕像,至今那雕像仍矗立在当地;20世纪南怀仁的第二座雕像在他的家乡Pittem建立。尽管他知名度颇高,人们对于他的科学贡献却所知甚少,因为从事这方面学术研究的人并不多。1988年南怀仁研究中心在鲁汶的国际学术会议中提倡南怀仁的研究,会议论文集由“华裔学志”出版,协会的资深研究员——高华士博士,至今已出版了两本深入探讨南怀仁的书,另外他的第三本和第四本书预计2009年出版在协会的“鲁汶中国丛书”之中。除此之外,我们在过去的25年中也出版了研究柏应理和鲁日满的书,关于鲁日满的研究已被翻译并出版在清史系列之中。

Yves de Thomaz de Bossiere女士在这领域是自学的专家,她出版了张诚(耶稣会士,1654—1707)的研究,张诚是法国最出名的“国王数学家”,由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世派遣到中国的宫廷,这研究非常契

合我们的“鲁汶中国研究丛书”，因为正是南怀仁把张诚介绍给中国的皇帝，并让张诚指导他关于西方的科学事宜，我们很乐意见到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并收录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的丛书之中。

2009年鲁汶大学南怀仁研究中心计划与中国社科院的近代史研究所合作，共同在北京召开我们第十届的学术会议，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能有更多的出版品被翻译成中文。未来我们将继续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同时也希望投入现代中国的研究，还有低地国传教士与中国的合作，以及他们对建立中国天主教会的贡献。协会特别强调教会对“中华无名英雄”的研究，也就是研究那些对建立中国本地教会有卓越贡献，可是却不为人知的国籍神父、修女和一般教友。总之，我们乐见中国人与非中国人、教友与非教友之间的合作研究，我们的标准是建立在历史档案的稳固学术基础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重视与中国学术机构合作的原因。

韩德力，圣母圣心会  
比利时鲁汶大学南怀仁研究中心主任



## 序言

17和18世纪耶稣会在华传教事业的著名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于1697年写道：“我认为这一传教事业无论对于天主的荣耀来说……还是对于人类的普遍幸福以及科学与艺术的发展来说，无论是在我们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当前最重大的事件。”<sup>①</sup>在那个时代，欧洲人对中国具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对于西方来说，中国是陌生而神秘的，他们只有凭借耶稣会士的记述才能对这个国家略有所知。所以，耶稣会士堪称第一批汉学家。中国和欧洲的学者与文人之间的文化交流由此产生。

在为博西耶尔夫人所著《17和18世纪在中国宫廷的一位比利时官员——安多，1644—1709。安多平施》（*Un Belge mandarin à la Cour de Chin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Antoine Thomas. 1644—1709. Ngan To P'ing-che*）（以下简称《17和18世纪在中国宫廷的一位比利时官员——安多》）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谢和耐（Jacques Gernet）的评述颇有见地，他说：“从利玛窦于1583年进入广东到钱德明神父于1793年在北京去世，早期耶稣会在华传教事业令人兴味盎

<sup>①</sup> 伊莎贝尔和让·路易·维斯埃尔编：《耶稣会士中国传教信札（1702—1776）》（*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巴黎，1979，第13页。

督的理想启程来华。该会在华的历史可以上溯至亚洲伟大的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在使不少印度民众接受福音之后，沙勿略来到日本，他意识到了两件事情：首先，在与具有高深文化修养的民族接触时，显而易见的是，要传播福音，就必须重视该国的文化与宗教；其次，最好的方法是先从知识精英、皇帝、高官和文人入手。因为民众景从他们。他同时认识到，日本的高度文明源自中国。因此，如果要归化亚洲，就必须前往中国，设法觐见皇帝。

为了实现其梦想，沙勿略启程前往中国。但他满怀遗憾地于1552年12月2日在中国大门口的一座小岛——上川岛上去世。就在几个星期之前（1552年10月6日），利玛窦（1552—1610）——一个将要实现沙勿略梦想的人、耶稣会在华传教事业的奠基者——诞生于意大利马切拉塔（Macerata）。居于沙勿略与利玛窦之间的是另一位气魄非凡的耶稣会士，即耶稣会亚洲视察员、那不勒斯人范礼安神父。他本人亦怀有沙勿略式的梦想，并选择其意大利同胞罗明坚和随后的利玛窦这两位才华出众的学者着手开拓中国传教事业。在投身于这一巨大的冒险性事业之前，他们必须先深入了解中国的语言与文化。

\* \* \* \* \*

在那个时代，西方人对中国所知甚微。他们只能逐步揭开这一称之为中华帝国的幅员辽阔的国家的面纱。中国以世界的中心自居，视其他国家为藩属或附庸。它把外国人当作未开化者加以提防。漫长的国境线被封锁起来并加以严密警戒。这个国家的行政体系组织严密，权力高度集中。在数个世纪里，中国文明一直居于欧洲文明之上。

\* \* \* \* \*

经罗明坚和利玛窦多番恳求，广东总督终于邀请他们到其辖区首府<sup>①</sup>展现欧洲丰富的文化与科学技术。

① 指肇庆。——译者注



这一艰巨事业的成功要特别归功于利玛窦，他比罗明坚更年轻，更具天赋，也更有备而来，后者受范礼安的派遣于1688年返回罗马。耶稣会士的出发地是澳门半岛，明朝皇帝出于通商目的而将此地让予（应是强行租占——译者）葡萄牙人，澳门遂成为欧洲人商业与宗教活动的中枢，后来它却变成反对耶稣会在华传教事业的堡垒。1583年9月10日，罗明坚和利玛窦获得进入广东的许可。在成功地进入北京（1601年1月）并得蒙皇帝召见之前，利玛窦还要付出17年艰苦不懈的努力。利氏是以杰出的中国文人和西方科学家的身份出现的，他以其丰富的数学、天文、地理知识和对中国经籍的了解而赢得了皇帝的信任。利氏才智超群，天赋过人，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同时，他和蔼可亲，性格坚毅，谈吐儒雅，善于交际，友朋遍布朝野，并赢得了皇帝及其近臣的信任。

利玛窦因其新开创的传教方法而闻名。这位大胆的革新者将中国传统的精华要素融入教理，使天主教信仰与中国文化相适应。他允许基督徒祭祖敬孔，认为这些纯粹世俗的礼仪已不再具有宗教意味。他还运用中国传统的宗教术语来翻译天主教的概念，如“天主”（Dieu）。这种本土化（inculturation）是一种变革性的传教方法，它很快就遭致反对（详见下文）。

其他耶稣会士继承了利玛窦的传统。和他一样，这些人素养颇高：意大利人龙华民，尤其是德国人汤若望和弗拉芒人<sup>①</sup>南怀仁。南怀仁这一学识渊博的天才后来成为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康熙皇帝的心腹，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负责北京观象台和修历工作（1669—1688）。<sup>②</sup>南氏接受了清朝官衔。耶稣会士执掌这一高级职务直至1774年。

福音传播方面，耶稣会士的努力也结出了硕果。据统计，1624

<sup>①</sup> 弗拉芒人（Flamand）指比利时北部地区讲荷兰语的居民。——译者注

<sup>②</sup> 由于历法负有调节民众社会与宗教生活节律的职责，所以每年的修历工作非常重要。



年有 1.3 万名基督徒,其中士流颇众。1650 年,基督徒人数约为 15 万,1664 年为 25 万。到 17 世纪末,基督徒人数已达 30 万,这种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康熙皇帝的宽容与同情。在 18 世纪接连不断的教难中,基督徒群体通常在秘密状态下得以幸存。

\* \* \* \* \*

在南怀仁来华之时,耶稣会在华传教团体是一个葡萄牙传教团体,尽管大多数传教士都属于其他国家。1493 年,教宗亚历山大六世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就已经发现和尚未发现的新大陆进行划分。他也将传布福音的责任托付给两国的国王,而没有预见到这会导致什么样的弊端。<sup>①</sup>保教权经常被用于促进政治和商业利益。大体上说,除菲律宾被西班牙占领外,亚洲成为葡萄牙的势力范围。

传教士到东方来必须乘坐葡萄牙船只,持葡萄牙护照,为葡萄牙利益服务。耶稣会在印度设立了修会会省(设于果阿),下辖日本副省和中国副省(分设于澳门和北京)。葡萄牙在印度支那、日本和中国粗暴地行使其保教权,这些国家并没有沦为它的附庸,但它与这些国家保持着商业往来。

为了确保中国传教事业的未来,南怀仁于 1683 年派遣其同会会士、比利时人柏应理返欧招募精通数学和天文学的传教士。<sup>②</sup> 通过路易十四的大臣和国务秘书科贝尔的介绍,柏应理终于引起了太阳王的关注。国王被他的这一理念所打动,并相信通过这种方式,法国可以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扩大自身的影响,因为法国在这一地区落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国之后。国王决定向中国皇帝派遣 6 位精通数学的耶稣会士,并赋予他们巴黎科学院通讯院士的头衔,而根本不理会这样做是否会招致罗马和里斯本的不满。此项事业完全由

① 原文中的 Patronato 和 padroado 均为“保教权”之意,前者为西班牙文,后者为葡萄牙文。——译者注

② 参见韩德力编:《耶稣会士柏应理(1623—1693),将中国介绍给欧洲的人》(Philippe Couplet, S. J. 1623—1693. *The Man Who Brought China to Europe*),“华裔学志专题系列”,德国圣奥斯定,1990。



法国国王资助。

1685年3月，“皇家数学家”们在布雷斯特(Brest)登上一艘法国船，他们是：洪若翰、张诚、李明、刘应、白晋和居伊·塔夏尔。塔夏尔后来留在暹罗。其余5位于1687年7月23日抵达中国南部港口宁波，尽管葡萄牙人试图阻止他们并将其遣送回欧洲，他们还是于1688年2月8日进入北京。葡萄牙人把这些法国人视为僭越者和竞争对手。多亏南怀仁向康熙皇帝荐言，这几位“数学家”才能一路顺风抵达北京。不幸的是，南怀仁于1688年1月去世，离他们到达只有几天时间。康熙皇帝对数学家们礼遇有加，并留白晋和张诚在内廷服务。其余3位传教士得到允许，可在帝国境内任何地方居住并传教。尽管遭到葡萄牙耶稣会士的反对，张诚还是成为南怀仁的继任者。

由于和葡萄牙人同住难以忍受，康熙皇帝遂于1700年为法国耶稣会士另外提供了一处寓所。路易十四要求罗马耶稣会总会长通过任命一位地方“总会长”的方式，赋予法国在华传教团体特殊地位。耶稣会总会长于1700年同意了这一要求，选择张诚担任这一职务，并授予他副省会长的权力。自此，法国耶稣会在华传教团体不再隶属于葡萄牙耶稣会中国副省。

\* \* \* \* \*

鉴于康熙皇帝在天主教传教史上所扮演的非凡角色，有必要就其作特别说明。他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位皇帝，也是中国最负盛名的皇帝之一。他生于1654年，1662年即位，1667年废除他的摄政王，在位61年之后于1722年去世。他是一位非常睿智、有深厚学养、充满活力的人，是一位卓越的统帅和君王。他要求耶稣会士向他讲授欧洲科学，以完善其知识。这些耶稣会士也向他讲授天主教教义。皇帝对这些神父要求甚高，但同时又对他们表现出极大的信赖和真正的器重。他允许他们自由传教。

康熙和他同时代的路易十四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和路易十四一样，康熙也是一位专制君主；和路易十四一样，他在位时间也很长，



也居住在金碧辉煌的宫殿之中，甚至比太阳王的宫殿还要壮丽。他们互赠礼物。康熙期望耶稣会士能完全效忠于他，并且不接受他们对于其他最高统治者还具有义务这一事实。

\* \* \* \* \*

在 17 和 18 世纪，人们已对耶稣会传教的历史产生浓厚兴趣；今天，它仍然是历史学家、汉学家和传教士深入研究的对象。但是，人们的注意力首先指向耶稣会士最著名的代表，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主要人物。稍微次要的人物或多或少地被遗忘了，然而，他们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博西耶尔夫人已经出版了两部著作，第一部著作于 1977 年在巴黎问世，题名为《17 和 18 世纪在中国宫廷的一位比利时官员——安多》，第二部著作于 1982 年在巴黎问世，题名为《殷弘绪和 17 世纪中国对欧洲的贡献》(François - Xavier Dentrecolles et l'apport de la Chine à l'Europe du XVII<sup>e</sup> siècle)。此后，她着手研究另一位伟大的传教士张诚的大量书信和著述。在张诚担任法国在华传教团体总会长期间，安多是他的合作者，殷弘绪则是他的继任者。他们三位有许多共同点。对张诚的生平和活动进行描述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法国在华传教团体这段最令人感兴趣的历史。

张诚是南怀仁当之无愧的继承人。他温文尔雅，具有非凡的语言天赋、卓越的地图测绘能力和外交谈判能力。康熙非常宠信张诚，而张诚则为皇帝提供着不可或缺的服务。

\* \* \* \* \*

中国在这一时期正卷入多起冲突之中。首先在中俄边界存在对抗。阿尔巴津或雅克萨前哨就是中俄两国数次交战的战场，此处几经易手。为了解决另一个冲突——蒙古的喀尔喀部和厄鲁特部之间的部落战争——中国人希望和平，康熙皇帝同意与俄国人谈判。由于中俄两国之间不具备进行谈判所需要的通用语言，康熙皇帝选派徐日昇和张诚充任译员。

中国代表团为到达谈判地点所做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实际



上,为了到达谈判地点,必须穿越一片戈壁沙漠以及蒙古部落正在交战的地区。他们于1689年所做的第二次尝试获得了成功,尼布楚(会谈所在地)谈判也进展顺利。<sup>①</sup>多亏张诚在谈判期间的居间调停起了决定作用,《尼布楚条约》于1689年9月6日得以签订。

这一条约具有相当重要的国际意义,它是近代中国与西方强国订立的第一个条约。对于中国来说,它开启了一个与欧洲合作的新时代。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耶稣会士的帮助,这一条约是不可能成功缔结的。然而,他们的处境是相当困难的。他们既不能偏向俄国,也不能偏向中国。与此同时,他们还必须尽力保护耶稣会的利益,因为耶稣会想开辟一条通向中国的陆路。

一部分是为了回报耶稣会士为此次谈判成功所作的贡献,康熙皇帝于1692年颁布了“宽容谕旨”,准许天主教在华传布。<sup>②</sup>

\* \* \* \* \*

利玛窦去世后,他的传教方法在传教士之间所引起的争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sup>③</sup>少数耶稣会士深信,遵守利玛窦方法的基督徒是偶像崇拜者和沉湎于信仰调和论的人。自菲律宾入华的其他修会的西班牙传教士也批评利玛窦的传教方法。他们的传教方式是那种“白板”方法。<sup>④</sup>此外,隶属于新成立的“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法国传教士也与耶稣会的反对者联合起来。

为了使印度支那、日本和中国摆脱葡萄牙保教权的控制并把传教事业掌握在自己手里,教宗亲自派遣服从宗座代牧的传教士前往

① Nertchinsk(涅尔琴斯克):中国传统名称为“尼布楚”,1658年俄国强占该地并将其改名为涅尔琴斯克。——译者注

② 参见博西耶尔:《17和18世纪在中国宫廷的一位比利时官员——安多》,第80、81页。

③ 为了更深入地阐述,请参看博西耶尔:《17和18世纪在中国宫廷的一位比利时官员——安多》,第91—108页。

④ 白板(tabula rasa),指人出生时未受外界和自身经验影响的纯净的心灵。——译者注



这些国家,他们全都是法国人。葡萄牙人也把他们视为僭越者。但在礼仪之争中,他们也加入了法国耶稣会士的敌对阵营。他们的宗座代牧之一严当在攻击中国礼仪中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发布教令禁止传教士和基督徒行中国礼仪,向罗马圣职部发出呼吁,并提醒巴黎的索邦(Sorbonne)神学院。

罗马的判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倾向于耶稣会士的,但由于从中国不断传来对耶稣会士的指控,其态度也很快发生了变化。罗马最后以禁行中国礼仪结束了这场争论。除了宗教上的原因以外,在其中起作用的还有民族和政治的因素,甚至商业活动也对此有所影响。信息传递得极为缓慢也十分误事,在中国和罗马之间,一次信件往复有时需要三四年的时间。

17世纪末,礼仪之争在欧洲,尤其在法国引起强烈反响。耶稣会士的死敌——杨森派和索邦神学院禁止使用利玛窦的传教方法。

教宗克莱孟十一世决定禁止中国礼仪,并派遣铎罗主教为特使,携其敕令前往中国。为了向康熙皇帝通报教宗的决定,铎罗于1705年12月4日抵达北京。这次不当的访问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他的鲁莽行为触怒了康熙,皇帝决定将其遣送回澳门。康熙皇帝被激怒不仅是因为中国的内部事务遭到了外来势力的干涉,还因为这一外来势力无视他已经发出的有关中国礼仪之世俗性的正式谕令。他禁止公布教宗敕令。1706年,他废除了1692年的宽容谕旨,要求所有想居留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必须领“票”,即传布福音的许可证。他们还必须保证遵循利玛窦规矩,不传授任何有违中国传统的东西。这一决定在传教士和基督徒中引起极大恐慌,最终成为他们遭受迫害的动因。拒绝领票的传教士被驱逐出境。

得悉中国这一令人不安的情形之后,教宗克莱孟十一世于1720年另遣嘉乐为特使前往中国。康熙皇帝拒绝接见他,迫使其离开中国。<sup>①</sup>此后传教士的处境每况愈下。

<sup>①</sup> 1720—1721年,康熙曾数次召见嘉乐,亦未曾强令其离境。——译者注



张诚神父于1707年去世，他与礼仪之争关系极为密切，这一争论在他的最后岁月里不断激化。为了促成康熙皇帝与铎罗特使的相互谅解，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他和康熙皇帝之间长期存在的友谊也因此而受到损害。他进退两难：一方面，耶稣会士的反对者指控他不遵行教宗的命令；另一方面，中国皇帝被教廷的公开行动所激怒。张诚首先寻求和睦与妥协，如向其同胞、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先生们”表示友好，而他们却和他的对手过从甚密。

康熙皇帝虽然继续信任张诚，但已大不如前。他对张诚的信任有所减弱的迹象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事实得到说明：当张诚安葬的时候，没有任何来自康熙皇帝的正式表示。

\* \* \* \* \*

像此前的两部著作一样，为了撰写这部新著，博西耶尔夫人不仅要有很强的语言能力，而且要有极大的勇气和耐心。她需要查阅许多散处各地的档案文献！我们只能对这一崇高的工作表示敬意……这是一项需要为之付出长期努力的工作。我们要感谢她使我们有机会利用其有趣的发现。

愿她的著作能够对人们认识耶稣会在华传教这一不朽事业作出真正的贡献。无疑，在这一领域里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如解读欧洲的档案，如有可能的话还要查阅中国的档案，我们希望这一日子为期不远。

圣母圣心会士欧麦尔·德格里杰斯

(Omer Degrijse, C. I. C. M.)



Gabiani, 1623—1694) 宣布修会誓愿。<sup>①</sup>

下文我们将追述其前往暹罗和中国的充满波折的艰难旅程：他于1687年抵达中国；他在蒙古地区的8次旅行（其中大部分时间是陪同康熙皇帝）；他所参与的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他在1692年康熙颁布准许传教士自由传教的宽容谕旨中所起的作用；他作为皇帝的数学、地理和哲学教师在北京的角色与生活。

张诚是一位无畏而不知疲倦的旅行家。在耶稣会士去蒙古的所有旅行中，张诚的旅行是最重要的。如果他所作的旅行次数（总共8次）惹人注目的话，那么进行这些旅行的历史环境和张诚所提供的关于蒙古及其居民的大量详细资料就更令人惊叹不已。有2次旅行是朝着鄂尔多斯方向，其中一次经过宁夏，另一次经过归化城。第3次旅行通过归化城而进入喀尔喀地区。其他5次旅行都以蒙古东部为目的，尤其以喀喇沁、翁牛特、敖汉和奈曼的西部部落为目的。<sup>②</sup>

1699年，张诚被任命为北京耶稣会会院院长，1700年11月30日又被任命为法国耶稣会在华传教团体的第一任总会长，法国耶稣会在华传教团体自此与葡萄牙耶稣会的中国副省相分离；他还获得了任命其继任者的权力。<sup>③</sup>

我们也将探究1705至1707年间张诚与教宗特使铎罗总主教的关系。<sup>④</sup>

最后，我要向南怀仁文化协会的范齐安修女（Christiane Vanden-

① 罗马耶稣会档案馆，*Lus.* 11, 171—172（修会誓愿，2页，有签名）。

② 贺歌南（J. Van Hecken），《东蒙古传教史文献：热河教区》（*Documentatie betreffende de Missiegeschiedenis van Oost - Mongolië, Bisdom Jé - ho - ehr*），9卷本，第2卷，第12—16页，出版地点不详，1970。

③ 耶稣会总会长梯尔索·冈萨雷斯（Tirso Gonzales）1700年11月23日函，马德里，国家档案馆，*Leg. jes.* 21, n. 102。

④ 铎罗：1668年12月21日生于都灵；铎罗伯爵夫人维克多·阿梅代（Victor Amédée Comtesse de Tournon）与尼斯伯爵领地行政长官阿尔毕侯爵（Marquis d'Albi）的第二个儿子；1710年6月8日在澳门逝世。



bogaert, 圣母圣心传教修女会) 表达我最诚挚的感谢, 她以其过硬的语言能力仔细审阅了我的手稿。她对原稿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和说明, 并作了某些必要的补充。

同样, 我要感谢包爱兰 (Els Bossier) 女士, 她也是南怀仁文化协会的成员, 她审查了书中所有的地理名词。她特别根据四种文献资料来进行这项工作, 它们是: 杜赫德 (Jean - Baptiste Du Halde) 的著作《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chronologique, histor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巴黎, 1735); 《皇家地理学家丹维尔先生根据耶稣会士实地考察绘制的地图以及张诚的个人回忆所绘制的中华鞑靼帝国全图(1732年3月)》(*Carte générale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dressée sur les cartes particulières faites sur les lieux par les RR. PP. jésuites et sur les mémoires particulières du P. Gerbillon par le Sr D'Anville, géographe ordre du roi. mars 1732*); 《中国及归中国统领鞑靼与西藏新图(含此国总图、详图以及高丽王国地图)》(大部分由在华耶稣会士和钦天监的满洲人遵照康熙皇帝的圣旨尽可能精确地实地测绘, 全图由耶稣会士们核校; 由丹维尔先生汇编成册, 阿姆斯特丹, 1785) (*Nouvel Atlas de la Chine,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 du Thibet; contenant les cartes générales et particulières de ces pays, ainsi que la carte du royaume de Corée; la plupart levées sur les lieux par ordre de l'empereur Kang - Hi avec toute l'exactitude imaginable, soit par les PP. Jesuites missionnaires à la Chine, soit par les Tartares du Tribunal des mathématiques, et toutes revues par les mêmes Pères; rédigées par Mr D'Anville. Amsterdam, 1785*); 瓦尔特·福煦 (Walter Fuchs) 的著作《康熙时代耶稣会士所绘地图: 它的绘制史及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地图的地名标识》, (北平, 1943) (*Der Jesuiten - Atlas der Kangshi - Zeit; seine Entstehungsgeschichte nebst Namensindices für die Karten der Mandjurei, Mongolei, Ostturkestan und Tibet. Peking, 1943*)。在可能的范围内, 她既用汉字又用汉语拼音标出了目前的中国地名。文中所涉及的汉字, 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以及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汉语拼音版,北京,1977)中所出现的地名外,均使用繁体字。

这些额外的研究使我们能够制作出一个文中所涉及的地名对照表,并尽可能使用张诚、丹维尔和瓦尔特·福煦等人的拼法。大部分中国地名均同时用汉字和拼音标出。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圣母圣心会的欧麦尔·德格里杰斯神父为本书惠赐序言。作为传教史学家,他对17和18世纪的传教事业作了饶有趣味的概述。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张诚所生活和工作的历史语境。

伊夫斯·德·托玛斯·德·博西耶尔夫人



## 第一章 前往暹罗和中国的航行 (1685—1688)

被路易十四派往暹罗和中国的6位学者与巴黎天文台首任台长乔瓦尼·多米尼克·卡西尼(Giovanni Domenico Cassini, 1625—1712)进行过多次会谈,为这一远行作准备。

在他们出发之前,巴黎科学院接纳了这6位学者,并遵照国王的命令,为他们配备了一切最完善的科学仪器,以便进行有益的科学观察。国王还下令为他们准备一些画有卢浮宫、凡尔赛、圣·日尔曼的铜版画以及数部装帧精美的图书作为呈献给康熙皇帝的礼物。

1685年3月3日,他们在布雷斯特港口搭乘由德·沃德里古尔(de Vaudricourt)先生指挥的“麻雀”号(l'Oyseau)军舰(配有46尊大炮)启程。随同出发的护卫舰为“魔鬼”号(Maligne)(配有24尊大炮),舰长德·饶瓦耶(de Joyeux)先生是布雷斯特港副长官,曾多次到过印度。

此次远航的目的是向暹罗宫廷派遣一个使团,作为对暹罗向巴黎派驻使臣的回应。1684年11月,路易十四曾在凡尔赛接见暹罗使团,暹罗国王以向法国开放一个通商口岸的方式请求与法国国王

结盟。法国使团包括肖蒙骑士(Chevalier de Chaumont)<sup>①</sup>、福尔班伯爵(Comte de Forbin)<sup>②</sup>、助手舒瓦齐(François de Choisy)、小修道院院长<sup>③</sup>以及6位耶稣会士数学家:居伊·塔夏尔神父<sup>④</sup>、刘应神父<sup>⑤</sup>、张诚神父、李明神父<sup>⑥</sup>、白晋神父<sup>⑦</sup>和洪若翰神父<sup>⑧</sup>,此外还有德·卢贝尔(de Loubère)先生、西贝莱(Ciberet)先生以及12名随员——他们是对此次远航感兴趣的宫内侍从。福尔班记述说,在离开港口时,一船人都高呼“国王万岁”。

经过7天航行,船抵马德拉岛(Île Madère),岛上群山均为白雪所覆盖;第13天,他们抵达棕榈岛(Île de la Palme),随后抵达铁岛(Île de Fer)和佛得角(Cap Vert);第33天,穿越赤道。

1685年5月31日船在好望角差点触礁,大风刮走了两张巨帆。有4艘巨大的荷兰战舰在那里抛锚。他们于翌日登陆,福尔班记述如下:

- ① 《肖蒙使团暹罗宫廷记述》(*Relation de l'Ambassade de Mr de Chaumont à la Cour du Roi de Siam*),巴黎,1687。书中并未提及张诚。
- ② 福尔班骑士:《福尔班伯爵暹罗旅行记》(*Voyage du Comte de Forbin à Siam*),1853。
- ③ 《舒瓦齐回忆录》(*Mémoires de Choisy, François de, 1644—1724*),1928。卡洛斯·索默尔沃格尔(Carlos Sommervogel)援引米肖(Michault)所述指出,张诚在“麻雀”号军舰上的记述已被舒瓦齐修道院院长用于撰写他本人的日记,“他仅仅对文字作了一些修饰”。1687年,《舒瓦齐回忆录》第一版问世(巴黎,Cramoisy)。
- ④ 塔夏尔著有《暹罗行记》(*Voyage au Siam*),巴黎,1687。
- ⑤ 刘应:1656年生,1709年出任克劳迪欧波利斯(Claudiopolis)主教;自中国被逐之后避难于彭蒂彻里(Pondichéry),1737年在那里去世。
- ⑥ 李明:1655年生于波尔多(Bordeaux),1688年抵达北京,1692年返回法国,1728年在波尔多去世。
- ⑦ 白晋:1656年生,1730年在北京去世。其父R. Bouvet曾任芒斯(Mans)初等法院推事。
- ⑧ 洪若翰:1643年生,1688年抵达北京,北京法国耶稣会会院首任院长。1703年离华,1710年在拉弗莱什(La Flèche)教会学校校长任上去世。《耶稣会士中国传教信札》第17卷(巴黎,1810)第166—265页的记述与1685至1688年前往中国的航行有关;1703年2月15日致弗朗索瓦·德·拉雪兹(François de La Chaise)神父函。另参见博西耶尔前揭书,第117—134页。



耶稣会的神父们首先向总督行屈膝礼，总督非常客气地接待了他们。这些神父向他表示，既然已经登陆，他们非常乐意利用他们的时间进行某些于公众有益的科学观测，在别的地方他们可能无法如此方便地进行这些观测。总督对此欣然同意，并安排他们住在位于印度公司花园中的一座豪华的独立房屋中，以方便他们工作。他们确实在那里进行了非常有用的各种观测，并校正了好望角的经度，这一经度此前尚未确定，而只是根据领航员的估计而得出的一个数据，其计算方法非常值得怀疑并易于出错。<sup>①</sup>

6月19日，舰队到达马达加斯加。

在巴达维亚(Batavia)，他们遇到了多米尼克·福西梯(Domenico Fuciti)神父。在极端危险的处境中，他在交趾支那和东京<sup>②</sup>工作了24年：他曾遭监禁，身带镣铐枷锁；由于被判处死刑，他潜居达12年之久。

9月22日，舰队停靠在暹罗沙洲入口。麦特洛波利斯(Metellopolis)衔主教路易·拉诺(Louis Laneau)<sup>③</sup>和梁弘仁(Artus de Lionne)神父<sup>④</sup>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

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张诚所写的长达242页的旅行报告，以前存放在里昂，现藏曼谷金刚智(Vajiravudh)国家图书馆。张诚也曾向其父母叙述了远航中国的曲折经历，但这些信件并没有全部被保存下来。

① 福尔班前揭书，第8—9页。

② 东京(Tonkin)：越南北部一地区的旧称。1887至1946年，此地为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部分。——译者注

③ 路易·拉诺：巴黎外方传教会士，1637年5月31日生；1673年任暹罗及南京宗座代牧；1696年3月16日在大城府(Ayuthia)去世。

④ 梁弘仁：1665年生于罗马，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大使和外交部长Hughes de Lionne之子。后被拉诺主教任命为副主教；1696年出任四川宗座代牧，领罗萨利(Rosalie)主教衔；为解决中国礼仪问题，于1702至1706年间留居罗马，1713年在巴黎去世。



据考狄(Henri Cordier)所论,1685年12月10日,肖蒙以路易十四使臣的身份与暹罗宰相康斯坦茨·弗尔孔(Constance Phaulkon)<sup>①</sup>在暹罗 Louvo 签订了一个条约,这一条约对于天主教在暹罗的传布具有重要意义,其5项条款均与自由从事宗教活动和保护传教士有关。

在1686年6月5日从暹罗写给父亲的信中,张诚罗列了通过多种路径寄往法国的不同信件。<sup>②</sup> 尽管他此前已经报告过他们与弗拉·那莱国王及其宰相弗尔孔的良好关系,但在这封信中仍怀着极大的热情予以重复。暹罗国王和宰相对新来的客人优礼有加,盛宴他们达七八次。这几位数学家可能当着弗拉·那莱国王的面观测了一次月食,国王亦于1685年12月私下召见了他们。

1686年4月底,当国王再次召见他们和拉诺主教的时候(这次召见持续了两个小时),该国的高级官员和弗尔孔跪在他们身后,脸几乎贴在地上,而他们却面朝国王坐在地毯上。

张诚赞扬了弗尔孔向他们所表示的友好态度:在弗尔孔外出的时候,总是带着他们中的一两个人,并设宴招待他们。这位宰相想把他们留在暹罗,而张诚认为自己此行的目的是赴缺少传教士的中

① 见奥尔良(d'Orleans)神父:《康斯坦茨·弗尔孔的历史》(*Histoire de Constance Phaulkon*),里昂,1754。弗尔孔是暹罗国王弗拉·那莱(Phra Narai)的宰相,权势极大。弗尔孔生于希腊克利福尼亚岛(Cephalonie)的库斯托德(Custode),父亲是威尼斯人,母亲是希腊人。他早年信奉天主教,后在英国改信新教。受印度公司招募,他得以来到暹罗。来到暹罗后,他对该国国民的政治见解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暹罗国王同意他的意见,赋予传教士以行动自由,又出资为他们兴建会院和教堂,方便他们居留和传教。但显而易见,弗尔孔内心的想法是尽可能与欧洲建立新的商业接触并获取路易十四的保护,因为他畏惧荷兰人。这就是他组织暹罗代表团前往巴黎的原因。1684年11月,这一代表团在凡尔赛得蒙路易十四接见,他请求与路易十四结盟,并向法国提供一个港口以进行通商。路易十四派出肖蒙骑士和舒瓦齐两位使臣,在塔夏尔的带领下前往暹罗,陪同他们的有前往中国的5位数学家。1688年,弗尔孔在暹罗的一次骚乱中被暗杀,时年41岁(参见博西耶尔:《17和18世纪在中国宫廷的一位比利时官员——安多》,第20—21页)。

② 原函见美国伊萨卡康奈尔大学瓦松(Wason Collection)珍藏。参见考狄:《张诚神父未刊函牍五件》(*Cinq lettres inédites du Père Gerbillon, S. J.*),《通报》系列二,7(1906),第436—468页。